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GEOFFREY
CHAUCER

乔叟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ffrey Chaucer Studies

肖明翰 著



 译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主编
陈众议



乔叟学术史研究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ffrey Chaucer Studies

肖明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叟学术史研究 / 肖明翰著.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9.2
(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 陈众议主编)

ISBN 978-7-5447-7556-4

I.①乔… II.①肖… III.①乔叟(Chaucer, Geoffrey 约1343—1400) — 人物研究 ②乔叟(Chaucer, Geoffrey 约1343—1400) — 诗歌研究 IV.①K835.615.6 ②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4450 号

乔叟学术史研究 肖明翰 / 著

责任编辑 韩继坤
装帧设计 韦 枫
校 对 蒋 燕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4.5
插 页 2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56-4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总序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新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谓文学最不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更是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

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惟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与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

此外,较之于创作,文学研究则更具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属性,因而更取决于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社会发展水平。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如是,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外国文学研究更是如此。虽然以鲁迅为旗手的新文学运动十分重视外国文学,但从实际成果看,1949年前的外国文学研究却基本上属于旁批眉注、前言后记式的简单介绍,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面展开的,而系统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这还是第一次。

学术史研究也是一种过程学,而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过程学。不具备一定的学术史视野,哪怕是潜在的学术史视野,任何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是不能想象的。

然而,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结果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于是,许多人不屑于相对客观的学术史研究而热衷于空洞的理论了。在有些人眼里,甚至连相对客观的真理观也消失殆尽了。于是,过去

的“一里不同俗，十里言语殊”，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于是，众声喧哗，且言必称狂欢，言必称多元，言必称虚拟和不确定。这对谁最有利呢？也许是跨国资本吧。无论解构主义者初衷如何，解构风潮的实际效果是：不仅相当程度上消解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甚至对国家意识形态，至少是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都构成了威胁。然而，所谓的“文明冲突”归根结底是利益冲突，而“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的时鲜谬论也只有在跨国公司时代才可能产生。

且说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中首当其冲，成为解构对象，它们不是被迫“淡出”，便是横遭肢解。所谓的文学终结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它与其说指向创作实际，毋宁说是指向传统认知、价值和审美取向的全方位的颠覆。因此，经典的重构多少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

正是基于上述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着手设计“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计划，并于翌年将该计划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十一五规划”。这是一项向着重构的整合工程，它的应运而生，标志着外文所在原有的“三套丛书”（即20世纪60至90年代——“文革”时期中断——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工作的基础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意味着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开始对解构风潮之后的学术相对化、碎片化和虚无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清算。

于是，关乎经典的一系列问题将在这一系统工程中被重新提出。比如，何为经典？经典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经典重在表现人类的永恒矛盾（用钱锺书的话说是“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呢，还是主要指向时代社会的现实矛盾？它们在认知方式、价值判断、审美取向方面有何特征？经典及经典批评与时代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关系何如？批评及批评家的作用（包括其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与时代社会的一般和特殊关系）又如何？此外，经典作家的遭际与性情、阅历与禀赋，经典的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以及文学的一般规律和文学经典的特殊性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将是本工程需要展示并探讨的。

且说世界文学一路走来,其规律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童年的神话、少年的史诗、青年的戏剧、中年的小说、老年的传记是一种概括。由高向低、由外而内、由强至弱、由大到小等等,也不失为一种轨辙。如是,文学从模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终于一头扎进了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死胡同。小我取代了大我,观念取代了情节;“阿基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是谓下现实主义。当然,这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事实上,认知与价值、审美与方法等等的背反或迎合、持守或规避所在皆是。况且,无论“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经典是说不尽的,这也是由时代社会及经典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所生发的。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向来重视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在反映和揭示社会本质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在分析英国社会时就曾指出,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恩格斯也说,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则干脆地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这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而是说伟大作家所描绘的生活、所表现的情感、所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抽象的概括、数据的统计。文学更加具体、更加逼真,因而也更加感人、更加传神。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载道与传道功能更不待言。站在世纪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重新审视外国文学,梳理其经典,展开研究之研究,将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世界文明的律动和了解不同民族的个性,而且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

交流,从而为我们借鉴和吸收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他山之石”。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传承和丰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二为方针”。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和介质,既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一时一地人心、民心的最深刻、最具体的体现,而外国文学则是建立在外国各民族无数作家基础上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象反映。研究人心自然不能停留在简单抽象的理念上,因此,走进经典永远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人心、民心的最佳途径。换言之,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变化着的活的灵魂,而其中的经典(包括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化着的活的灵魂的集中体现。

如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从我出发,以我为主,瞄准外国文学经典作家作品和思潮流派,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梳理。第一辑、第二辑和第三辑由二十二部学术史研究专著、二十二部配套译著组成:第一辑涉及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左拉、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和海明威;第二辑包括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康拉德、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索尔·贝娄和芥川龙之介;第三辑涵盖陀思妥耶夫斯基、乔叟、简·奥斯丁、普鲁斯特、泰戈尔和希伯来《圣经》文学。

三

格物致知,信而有证;厘清源流,以利甄别。“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学术史研究系列,顾名思义都是学术史研究(或谓研究之研究)。学术史研究既是对一般博士论文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文化积累工程,同时还可以杜绝有关领域的低水平重复。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通过尽可能抽丝剥茧式的梳理,即使不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至少也能老老实实在地

将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包括有关研究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公之于众,以裨来者考。如能温故知新,有所创建,则读者幸甚,学界幸甚。相配套的经典论文翻译,则遴选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阶段性和标志性成果,其形式类似于外文所先前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此次面世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的每一部学术史研究著作将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经典作家(作品)的学术史梳理。这是相对客观的,但其中的艰难也不可小觑。首先,学术史梳理既不像平素泛舟书海,拾贝书海,尽意兴而为之的俯拾由己和随心所欲;其次,牵涉语种繁多,而且经过20世纪的形形色色的方法论和批评思潮的浸染,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经典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已不为过。因此,要在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方法,实在是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事情。战战兢兢,生怕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且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因此,我们只能择要概述,甚至把侧重点放在经典作家的代表作上。不然纵使篇幅再大,也难以涵括浩瀚的文献资料。换言之,去芜杂的枝蔓和重复的敷衍,留精粹要义和真知灼见是必然的,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它考验我们涉猎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也是检验我们学术水准和价值判断的重要环节。

第二部分研究之研究何啻是一大考验。都说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在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标新立异和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风潮之后,在各种思潮、各种方法杂然纷呈的情况下,如何言之有物、言之成理、不炒冷饭,殊是不易;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前进,就更是难上加难。反过来看,正因为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和批评的多元,也才有了我们展示立场、发表见解的特殊理由和广阔余地。举个简单的例子,解构主义针对二元论的颠覆虽然是形而上学的,却不可谓不彻底。其结果是相当一部分学者怀疑甚至放弃了二元思维,但事实上,二元思维不仅难以消解,而且在可以想见的未来仍将是人类思维的主要方法。真假、善恶、美丑、你我、男女、东方和西方等等实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学者,面对西方话语,我们并非无话可说。总之,从文学出

发,关心小我与大我、外力与内因、形式与内容、反映与想象、情节与观念,以至于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西方与东方等诸如此类的二元问题,以及经典在民族和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可以是我们的着力点。当然,二元论绝不是排中律,而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融会二元关系及二元之间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无限可能性。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广开言路,但日新月异中不乏矫枉过正、时髦是趋。比如大到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小到客观与主观、客体与主体等等,都大有乾坤倒转、黑洞化吸之势。至于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意识形态更是有增无已;真假不辨、善恶不论、美丑混淆的现象所在皆是;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从而使抽象的人性淹没了社会性;普世主义势不可挡,以致文化相对主义甚嚣尘上。文学从大我到小我,从外向到内倾,从模仿到虚拟,从代言到众声喧哗;真实给虚幻让步,艺术向资本低头;对妖魔鬼怪和封建迷信津津乐道,任帝王将相和无厘头充斥视阈,能不发人深省?然而,经典作家是说不尽的,以上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是无法穷尽的。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经典具有“自我翻新”的本领。至于何为经典,虽然也是个说不尽的话题,但用简单的方式综观前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它们必须体现时代社会(及民族)的最高认知和一般价值(包括人类永恒的主题、永恒的矛盾);二是其方法的魅力及审美的高度不会随着岁月的更迭而褪色或销蚀。当然这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说法。而本课题便是关乎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种较为复杂的论证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不等于市场。用桑塔亚那的话说,经典不在于一时一地喜欢者的多寡,而在于喜欢者的喜欢程度。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这话也就更加全面了。

学术史研究的最后部分为文献目录。它在尽可能详尽的基础上,还要有所选择。不然,展示一个经典作家的学术史,光文献目录就可以编辑厚厚的几大本。因此,去粗存精,是为重要或主要文献目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中长期目标是在作

家作品和流派思潮研究的同时,进行更具问题意识的学术史乃至学科史研究,以期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若能密切联系实际,促进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创新,则读者幸甚,我等幸甚。无疑,此工程面向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希望有志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同仁踊跃加盟、不吝赐教。

陈众议

绪言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约1343—1400)不仅在英语文学史上,而且在英语文学批评史上,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英语文学之父,他至今保持着几项纪录。其中之一就是,在英语文学家中,唯有他拥有英语世界历史上最长久且从未间断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而乔叟研究本身在英语文学批评领域也已形成一个重要传统。可以说,一部乔叟学术史就是一部英语文学批评史的缩影。

乔叟学术史是英语文学之父的文学成就、他的思想和艺术中的方方面面在六百多年来英国和西方历经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里,从不同视角在不同层面上被逐渐揭示出来,加以系统阐释,为历代文学家所借鉴和发扬,并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着英语文学传统的历史。同时,也正因为乔叟学术史与英格兰历史和文化之间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从一个特殊角度折射出英国社会、思想、文化与文学的变迁和英格兰民族的发展。因此,研究乔叟学术史,除其本身的价值外,也是从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侧面来审视、考察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和英格兰民族文化、民族意识之发展。

乔叟在生前就已受到英法诗人和学者的评说与高度赞誉。自那之后,所有时代的文学家、评论家和学者都对英诗之父进行广泛评论和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成果之丰富,用浩如烟海来形容,毫不为过。研究乔叟学术史,面对如此丰富的材料,“挂一漏万”虽属老生常谈,却是本书作者实实在在的隐忧。所以,叙述乔叟学术研究发展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审慎选择材料。为此,本书确定的基本原则是,既要突出每

个时代的代表性观点和成就,也必须在整体上关注乔叟学术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英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历史。因此在选材上,本书特别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每个时代重要的乔叟学者和评论家。他们大多也是该时代引领潮流的知识精英,因此他们往往最能代表该时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思想以体现时代精神,并特别深刻地影响后代乔叟学者。第二个方面是一些也许并不著名甚至没有留下姓名,其观点在当时也无代表性的学者、诗人,但他们留下了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他们的一些在当时似乎“不合时宜”的观点因为他们非凡的见解而在下一个时代甚至几百年后成为主流乔叟批评之先声。第三个方面是乔叟学术史和乔叟经典化历程中最重要,贡献也最大的一批人,他们是英语文学史上各时期那些杰出的诗人、作家。他们留下一些特别经典的评述,但更重要也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在文学创作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解读、研究、模仿、借鉴和改写乔叟诗作并继承和发展乔叟所奠定的英语文学传统,为乔叟学术史贡献了特别珍贵的部分。严格地说,正是他们使乔叟进入生生不息的英语文学传统,是他们使乔叟研究没有也不可能中断,甚至是他们真正使乔叟成为英语文学之父。所以,本书也特别重视陈述和揭示这些文学家对乔叟的评述、借鉴和发展。然而,正因为注重这几方面的选择,加之受制于本书作者的眼界和学识局限,许多评论家及其观点,很可能还包括一些特别独到、深刻的见解,令人遗憾地被遗漏或排除在外。好在本书仅仅是很可能没有终点的乔叟学术史研究进程中小小的一步,大量前辈学者和更多后来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弥补与纠正本书的不足和缺陷。

除了对材料的选择必须审慎外,本书作者深感对各时期观点的陈述也需要特别审慎。当然,陈述学者们之观点最基本的原则是客观。然而客观只能是相对的,因为连选择哪些学者、选择他们的什么论著,甚至选择同一本书或同一篇文章里何种观点进行陈述,乃至引用哪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选择者的主观性及其眼光、学识或者不足。

另外,在乔叟学术史研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很难让一些评论“自己说话”而不造成误解。那是因为英语文学之父还保持着另外一项纪录,那就是六百多年的乔叟学术史为他揭示或者说描绘出比任何其他英语文学家都远为丰富多彩而且不断变换,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形象,那是乔叟与各时代的历史语境、与各时期持不同思想的学者和文学家对话的产物,因而其意义也只能在产生它们的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由于乔叟学术史经历了英国社会、宗教、文化思想、文学观念和英语语言等所有方面巨大的变化,甚至一些术语的含义也与现在大为不同,所以许多对乔叟的评说,特别是那些往往最具时代特色的观点,如果不放回到产生它们的历史语境中并给予适当说明,就很难为今天的英国人,更不用说其他地区的人们所正确理解。当然,在本书中这样的说明在宏观上旨在建立历史语境,在微观上也只就特定的观点与时代语境的内在关联点到为止,不做对错评判。

乔叟学术史还表明,英诗之父不仅跨越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而且早已迈出了英国国门,甚至走出了英语世界,广受世界各地的读者喜爱和崇敬;如本书表明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文学家早已参与到乔叟研究中。到了近现代,乔叟远渡重洋,来到东方,他那些饮誉世界的杰作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东方的学者们也从东方的视角审视和研究这位享有崇高地位的英语文学之父,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论述。在本书中,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张炼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石小军副教授分别撰写了“乔叟在中国”和“乔叟在日本”两部分,梳理和探讨乔叟在东方这两个重要国度里传播、接受和研究的历程与成就。

在本书第二编里,本书作者就其在乔叟学术史的追求中感受最深,同时也特别被历代学者和文学家以各种形式关注,并引发了不少争议的几个方面,对乔叟的经典化历程、乔叟创作的互文与成就、乔叟形象之变迁与乔叟性,以及乔叟的文学思想等涉及乔叟的文学创作和乔叟学术史的几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做了初步探讨,算是研究乔叟学术史

的一点体会。

通过做乔叟学术史课题,我更进一步也更真切地感到,所谓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摘别人的桃子。就乔叟学术研究史而言,自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许多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没有他们经年累月的辛勤付出,本课题绝不可能完成。所以,本书仅仅是在无数前人艰辛努力的基础上稍有挪动,以期能为国内对乔叟和乔叟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拓宽视野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肖明翰

于长沙岳麓山

1 绪言

1 第一编 乔叟学术史

3.....	第一章 中世纪
4.....	第一节 乔叟对乔叟及其作品的评论
16.....	第二节 乔叟时代
24.....	第三节 15 世纪
36.....	第四节 苏格兰乔叟派
42.....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
44.....	第一节 亨利八世时代
55.....	第二节 伊丽莎白时代
81.....	第三章 新古典主义时期
83.....	第一节 低潮时期
93.....	第二节 德莱顿的研究及其影响
103.....	第三节 18 世纪
121.....	第四章 19 世纪
122.....	第一节 浪漫主义时期
145.....	第二节 维多利亚时代
179.....	第五章 现当代乔叟研究的发展与成就
181.....	第一节 乔叟作品版本、生平和学术史研究
197.....	第二节 历史主义和新批评时期
229.....	第三节 当代多元研究
263.....	第四节 乔叟与欧陆文学比较研究
301.....	第五节 乔叟在中国

315..... 第六节 乔叟在日本

335 第二编 乔叟学术史研究

337..... 第一章 乔叟的经典化历程

384..... 第二章 乔叟的成就与互文

416..... 第三章 乔叟形象的变迁与乔叟性

443..... 第四章 乔叟文学思想

467 附录一 重要文献

497 附录二 人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

516 附录三 书、报、刊名中外文对照及索引